

貳、

十九世紀末年日本人的臺灣論述： 以上野專一、福澤諭吉與內藤湖南為例

一、引言

1894 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中國慘敗，1895 年中日簽訂《馬關和約》，中國割地賠款，「關係七省門戶之臺灣，海外二百餘年戴天不二之臺灣」¹從此淪為新興的日本帝國之殖民地，開啓了日本統治臺灣半世紀的歷史。1895 年割臺不僅使臺灣「四百萬人同一哭」，而且也是中國近代史的轉捩點，²其影響綿延至於今日，歷史的傷痕至今仍未撫平。

在 1895 年割臺這件石破天驚的歷史變局的前後，日本官方及民間知識份子，或對臺灣進行第一手的調查，或對臺灣事務發表許多言論，這些文字具有重要史料價值。本文擬以當時日本駐華外交官上野專一（生卒年代不詳，1891 年來臺灣考

¹ 〈全臺紳民痛罵李鴻章文〉，收入王曉波編：《臺胞抗日文獻選新編》（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8），頁 15。

² 關於甲午之戰的研究成果，可謂車載斗量，參考：王仲孚主編：《甲午戰爭中文論著索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所，1994）。

察)、啓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834-1901)與漢學家內藤湖南(虎次郎,1866-1934)三位日本人,在19世紀末期發表的論述臺灣的文字爲中心,分析割臺前後日本人的臺灣觀,並探討他們的臺灣論述中所反映的日本知識界「脫亞入歐」的思想傾向及其問題之所在。

二、三位日本人及其臺灣觀之概要

關於日本據臺前後,日本人及西方人對臺灣的調查研究及其治理臺灣的具體意見,當代學者已有若干研究論著。吳文星曾探討日本據臺前夕對臺灣的調查,³也研究日據初期西方人的臺灣觀。⁴吳密察也曾研究福澤諭吉的臺灣論。⁵但是,本文寫作的重點與前此相關研究論著並不相同而可以互補。現有關於日本人的臺灣論的研究論文,重點在於說明日據前後,日本人對經營臺灣之種種具體策略與政策,本文則將研究重點放在日本人對臺灣的種種論述所表現的思想傾向,我們先對本文將探討的三位日本人及其對臺灣的看法,作一概要的說明,以作爲下節進一步分析之基礎。

³ 吳文星：〈日本據臺前對臺灣之調查與研究〉，收入：《第二屆臺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二）》（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人文教育研究中心，1995），頁567-576。

⁴ 吳文星：〈日據初期（1895-1910）西人的臺灣觀〉，《臺灣風物》，40卷1期（1990年3月），頁159-169。

⁵ 吳密察：〈福澤諭吉的臺灣論〉，收入氏著：《臺灣近代史研究》（臺北：

(一) 上野專一及其《臺灣視察復命》

本文擬探討的考察臺灣的日本人是上野專一，上野是 19 世紀末日本駐福州的領事，1891 年奉命來臺灣考察。任務完成後共撰成《臺灣視察復命》（原件題為《臺島視察復命》）四篇，編為一、二、三、四號，這批資料是日本據臺前夕，日本官方對臺灣考察的重要史料之一，現藏於東京的防衛大學附屬圖書館等地。《復命》內容頗為廣泛，涉及臺灣的地理、物產、經濟、民性、政治等各方面，頗為詳實。吳文星教授曾簡略介紹過這批文件的概要內容。⁶上野專一對臺灣的調查報告，在甲午之戰以後曾在日本輯為專書出版，連橫（雅堂，1878-1936）在 1908 至 1918 年撰寫《臺灣通史·經營志》時，曾參考上野專一的調查報告，並略引其要點。⁷上野專一的書對當時日本朝野人士對臺灣之瞭解頗有助益，此書並已於 1985 年由臺北成文出版社出版。⁸但是，臺北所影印出版的《臺灣視察復命》只收錄第 2 號、第 3 號及第 4 號，獨缺第 1 號之內容。第 2 號介紹臺灣之地理，包括府縣之建制，臺灣之物產與風俗。第 3

稻鄉出版社，1990），頁 71-112。

⁶ 同上註 3。

⁷ 連橫說：「[光緒] 16 年 2 月，日本駐福州領事上野專一來臺考察，歸著一論，謂臺灣物產之富，礦產之豐，一切日用之物無所不備，誠天與之寶庫也。然以臺灣政治因循姑息，貨置於地，坐而不取，寧不可惜。若以東洋政策而論，則臺灣之將來，日本人不可不為之注意也。」見：連橫：《臺灣通史》（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5），（上），卷 3，〈經營紀〉，頁 65。

⁸ 上野專一：《臺灣視察復命》（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明治 27 年抄本景印，

號介紹臺灣各地物產之交易狀況。第 4 號介紹臺灣原住民社會之生活習慣及其與漢人之關係。只有第 1 號之內容與本文之論旨有關。

上野專一是當時日本的職業外交官，職位是「二等領事」，根據《臺灣視察復命》第一號所載他與劉銘傳（省三，1836-1895）對話時的自我介紹，他是在 1889 年奉派福州，擔任領事，主管業務範圍包括廈門、淡水及臺灣府。他向劉銘傳說：「此次以領事的任務，即爲了通商，來臺巡迴視察，特別是臺灣的砂糖，向來是我國爲需要之物，爲此來探查商況」，⁹這份報告就是完成臺灣考察任務之後所撰寫。但是，正如本文第一節所說，本文的重點在於從日本人的臺灣觀中，析論其思想傾向，而不在於巨細靡遺地論述他們對臺灣的具體主張，所以，以下僅以收藏於防衛大學附屬圖書館的《臺灣視察復命》第一號抄本作為分析之基礎。

這份報告第一號的重點，包括幾個部份：首先，上野專一指出臺民以及原住民不喜劉銘傳之苛政酷稅，民心不穩，思欲謀叛。臺民希望有另一個外來政府取代清國的苛政。其次，上野專一詳細考察臺灣(尤其臺南與高雄)沿海之砲臺設置及其歷史，並對臺灣樟腦之商業情況進行瞭解。復次，上野對於宣教師在臺灣的佈教亦有描述，關於劉銘傳施政的許多消息，皆從

1985，列入《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103 號）。

⁹ 上野專一：《臺灣視察復命第一號》（手抄本），頁 21-22。

宣教師處獲得。上野專一也探察劉銘傳在臺灣島熱衷於洋學，以及設立西學堂積極培育人才的情形，並紀錄與劉銘傳及林維源（1840-1905）的對話，均扣緊鐵路實施的便利發言。最後，上野專一指出劉銘傳即將去職，而繼任者以及清政府將不會如劉銘傳一樣地治理臺灣，並強調臺灣物產豐盛，乃是上天賜予的寶藏之地，呼籲日本帝國當局應該積極關注臺灣的將來發展。

這份文件雖是日本帝國的外交官所撰的訪察報告，所涉及的都是具體的政經社會事務，但是，字裡行間卻也透露相當明顯的帝國主義心態，值得細加探討。

（二）福澤諭吉及其臺灣論述

福澤諭吉是近代日本的啓蒙思想家，從緒方洪庵（1810-1863）習蘭學，曾三度遊學歐美，¹⁰返國後提倡「文明開化」論，鼓吹自由民權及個人之獨立精神，與加藤弘之（1836-1916）、津田真道（1829-1903）、中村正直（1832-1891）、西周（1829-1897）等開明知識份子組織「明六社」。福澤諭吉著作甚多，約有 60 餘部，對 19 世紀末期處於從傳統邁向近代的日本社會，影響最大的是 1872（明治 5）年 2 月起至 1876（明治 9）年 11 月止，陸續發表的《勸學篇》一書。據福澤諭

¹⁰ 參看：福澤諭吉著，馬斌譯：《福澤諭吉自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頁 89-118，140-148。

吉自己在《勸學篇》合訂本的序言中說此書至 1880（明治 13）年時，「發行總數約有 70 萬冊，其中第一篇不下 20 萬冊。加之前版權法不嚴，偽版流傳很多，其數也可能有 10 多萬冊。假定第一篇的真偽版本共過 22 萬冊，以之與日本的 3500 萬人口相比較，則國民 160 人中必有一人讀過此書。這是自古以來罕有的發行人數，由此可以看出近來學問迅速發展的趨勢。」¹¹此書對當時日本社會之影響力至為可觀。此外，福澤諭吉在 1875（明治 8）年撰有《文明論概略》¹²一書，也是暢銷全日本，提倡「脫亞」論，此書與《勸學篇》一樣，也對近代日本的啓蒙發揮重大的作用。

福澤諭吉在 1882（明治 15）年創辦《時事新報》，以發表「不偏不黨的論點」¹³自我期許，對當時局勢發表看法。從 1894 年 12 月開始，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陸續發表多篇社論，對臺灣問題提出各種看法。這些臺灣論述的文字，一方面充分暴露福澤諭吉的帝國主義者的心態，另一方面也顯示了亞洲現代知識份子接受西方文明時，所出現的許多值得進一步深思的問題。

¹¹ 福澤諭吉：《學問のすすめ》（東京：岩波書店，1978）。中譯本：群力譯：《勸學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合訂本《勸學篇》序〉，頁 1。

¹² 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東京：岩波書店，1997）。中譯本：北京編譯社譯：《文明論概略》（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¹³ 《福澤諭吉自傳》，頁 267-8。

（三）內藤湖南及其臺灣評論

內藤湖南是 20 世紀日本漢學研究的大師，是中國史領域中所謂「京都學派」的創辦人，在成為京都帝國大學教授之前，曾任《大同新報》、《三河新聞》、《大阪朝日》等報社新聞記者，足跡甚廣，曾於 1899（明治 32）年 9 月 5 日起從神戶出發，來華遊覽，歷經山東、天津、北京、杭州、上海、漢口、武昌、鎮江等大江南北各地，與中國學者如嚴復（又陵，1853-1921）等人均有交往。¹⁴內藤湖南亦曾前往中國大陸東北地區進行學術調查研究。¹⁵在前往中國大陸旅遊之前，內藤湖南曾來臺灣，於 1897（明治 30）年 4 月，擔任創立於臺北的《臺灣日報》主筆，《臺灣日報》後來與《臺灣新報》合併成為《臺灣日日新報》，是當時日本殖民政府的官方喉舌。內藤湖南在臺灣滯留到 1898（明治 31）年 4 月，在臺灣一年多的時間裡，在《臺灣日報》發表多篇社論，廣泛評論臺灣的政治、交通、財政各方面問題，很能反映當時一些日本知識份子的臺灣觀。

內藤湖南精研中國歷史，學問自成一家之言，史學界一般

¹⁴ 關於內藤湖南的中國遊記，參看：內藤湖南：〈燕山楚水〉，收入《內藤湖南全集》第 2 卷（東京：筑摩書房，1971）。中譯本見王青譯：《兩個日本漢學家的中國紀行》（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並參考：黃俊傑：〈二十世紀初期日本漢學家眼中的文化中國與現實中國〉，收入拙著：《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 265-312。

¹⁵ 參考陶德民：〈內藤湖南の奉天調査における學術と政治——內藤文庫に残る 1905 年筆談記録をめぐって〉，《文化交流研究》第 1 号，頁 131-143。

通稱爲「內藤史學」。「內藤史學」的基本論點認爲：中國歷史發展到了唐宋之際是中國文化經濟巨變的時代；內藤湖南認爲唐代是中世社會之結束，宋代是近世社會之始，而唐末至五代則是唐宋轉型的過渡時期。唐宋的歷史轉型主要表現在（1）貴族政治衰微，君主獨裁代興，（2）君位的變化，（3）君主權力的確立，（4）人民地位的變化，（5）官吏任用法的變法，（6）朋黨性質的變化，（7）經濟生活則從唐代的「實物經濟」向宋代以後「貨幣經濟」轉變，（8）文化上出現經學、史學與文學的變化以及庶民文化的興起等現象。¹⁶在內藤湖南的著作中，以上這些作爲中國史的「近世」的指標，均以近代歐洲史作爲參考架構。

內藤湖南的學術世界的另一項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文化中心移動說」。中日甲午之戰以後，內藤湖南主張日本經此一役已然成爲新的文明中心，他說：¹⁷

夫河洛之澤盡，而關內之化盛；北方之文物枯，而南方之人文榮，亦以時而命之所也。埃及、西亞利亞、印度、波斯、菲尼斯亞、希臘、羅馬，相踵遞起，而各以時而命也。彼皆於其時，應是人道和文明宣揚之最力者，而

¹⁶ 參考：高明士：《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臺北：明文書局，1996 修訂版），頁 104-116。

¹⁷ 內藤湖南：〈日本の天職と學者〉，收入《內藤湖南全集》第 1 卷，頁 130。此文原發表於明治 27 年（1894 年，光緒 20 年，甲午）11 月 9 日、10 日之《大阪朝日新聞》。

又於其跡，各見克盡其任者。文明之中心，與時所以移動者其存由此，今又將大移，識者實久知此間之背紫，〔…〕

內藤湖南主張，生於文明中心的日本之國民，應「以斯邦而盡其人道之天賦」。¹⁸內藤這種主張，與他在臺灣時所發表的臺灣評論，頗可互相發明。

三、三位日本人的臺灣觀中的思想傾向：帝國主義思想

19 世紀末年上野專一、福澤諭吉、內藤湖南這三位日本人，身份不同，專業領域互異，上野是專職外交人員，福澤是提倡「脫亞入歐」的西化論者與啓蒙思想人物，內藤湖南則推崇中國文化的先進性，主張中國的「近世」開始於唐宋之際，而且是中國史研究的「京都學派」的創始人。但是，細繹他們三人針對臺灣所發表的諸多意見，卻呈現若干近似的帝國主義思想傾向。

所謂「帝國主義」(imperialism) 是一個涵義廣泛的名詞。在世界史上，帝國主義在不同時代與地區也各有互異的表現方式。我在這裡所謂「帝國主義」一詞，取其廣義而言，指稱「將

¹⁸ 內藤湖南：《內藤湖南全集》第 1 卷，頁 132-133。

母國的權力通過兼併或侵略等方式，而延伸或擴展到他國之領土與人民之上」¹⁹而言。上述心態就是一種帝國主義思想。在這項定義之下，本文所探討的 19 世紀末年的這三位日本人的臺灣觀，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帝國主義思想傾向。

（一）上野專一

首先，我們檢視日本外交官上野專一的想法。上野在《臺灣視察復命》第一號說：²⁰

此次若劉〔銘傳〕引退於臺島，由從前之關係推論所見，清國也必因此自然注目於該島之力日減。果然如此的話，今後對於該島之事業上，也許會引入外國之資本以繼續為之，故很難言不由外力來推展。掌握該島之將來，無論從東洋之政策上或對於我國人而言，我認為從今以後最有注意之必要。卑官此次巡查訪視該島之內部，除物產豐盛之外，又視察其他之事，實驚其富饒，如以金銀銅鐵類為始，其他如人民生活上必用之物品，無一不具全，真可稱天與之寶藏。關於土地關係，今宜十分注意其盡力於內地之開拓，若要把東洋一大富榮之

¹⁹ 關於「帝國主義」的定義，參看：Alan Bullock and Oliver Stallybrass, *The Fontana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 (London: Fontana Press, 1977), pp. 409-411; David Roberstson, *A Dictionary of Modern Politics*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 Ltd., 1985), pp. 154-155.

²⁰ 上野專一：《臺灣視察復命》，頁 37-38。

天地，創作於此島上，乃不難之事。然此島在支那姑息政策之統治下，永埋沒於此天與之寶物於地中。決不能成為世界之公益，誠可惜之事。卑官巡視臺灣府城安平之處，曾見荷蘭人所築之砲臺古跡，想到二百五十餘年前，我國人對於臺島之割據，大振威力於南清，將名聲顯耀給該島土民(荷蘭人在當時戰爭之後，把我日本之陣帽陣旗，作為賞給土兵之功勞，土兵咸喜此賞賜，而覺無上之光榮)。追懷往事，而想到今日我通商貿易，不振於東洋，不勝慨嘆。

上野專一在以上這一段臺灣視察報告的結論中說，過去日本之侵佔臺灣「大振威力於南清，將名聲顯耀給該島土民」，可謂十足的帝國主義者的口吻。

上野專一在高雄(當時稱為打狗)曾與一位在臺灣居住 20 年的英國醫師談話，他引述這位英國醫師的話說：²¹

近來內部土民之心情，羨慕外國人，想要暗地裡實現誘導外國進行保護干涉之事，迄今未果，我想今如果有一外國佔有臺灣之番地，細察土人之意向，施之以寬大之政治，嘗試使之免除政府之苛政，則彼等自然展開雙臂歡迎。現今支那官吏是否這樣喪失一般人民之歡心呢？本來無論臺灣南部，連北部亦以米穀為始的雜貨品等，

²¹ 上野專一：《臺灣視察復命》，頁 12-13。

並無另外徵收厘稅，只有地租之稅收制度，其實稅收是非常少的，甚至在其他地方都無稅收。自從劉銘傳來臺，謀求內地之開拓，頗被課予苛法之稅，可說是違反臺灣人民之向背。米穀不用說，砂糖以及其他實用的細末之食品，一概課予厘稅，而且從各地而來唱和他的清官候補員，伺候於劉之衙門，乞討就官者，其數達到幾百之多。而彼等若一朝得幸，得到任官，置內地貧富之如何於度外，到處汲汲於填滿自己的囊袋，只是自由自在地擠人民之膏血，此實清官人種之特情。追數臺島全部官吏不斷增加，但人民益增不平之聲，如客家種族，日日出沒於生蕃界，和上述人民之心情是一樣的，皆痛心地想要去抵抗地方官吏，以後更有進一步希望如下的說法：若乘此虛由他國佔領此蕃界，勸勉得到蕃民之信用，漸次布予德政，則掠取臺灣全島之事，蓋容易之事也。

在上野與英國人的對話之中，臺灣被當作無主之島而成爲被討論的對象，如何「掠取臺灣全島」才是這場對話的重點，充分透露出帝國主義者的心態。

（二）福澤諭吉

這種帝國主義心態，也很明確地表現在啓蒙思想人物福澤諭吉對臺灣的言論之中。福澤諭吉從 1894 年 12 月起至 1898 年 5 月止，在《時事新報》針對臺灣事務，發表一系列看法。

這一批以「社論」為名的系列文字，已由陳逸雄譯為中文刊佈，²²極具史料價值。這一系列文字中所涉及的具體政經主張已有學者加以介紹，²³本文將集中探討這一系列文字中所呈現的思想傾向。

福澤諭吉的臺灣論述，充分顯示他的帝國主義思想傾向，徹底違背他作為近代日本啓蒙思想家所提倡的各種開明主張。我們先分析福澤諭吉的帝國主義心態，再取他自己在日本國內的開明主張互作對比。福澤諭吉的帝國主義心態，在他的臺灣論述中表現在兩個方面：

(1) 對臺灣的土地之主張：福澤諭吉完全將臺灣視為日本帝國的海外殖民地處理。他在 1894 年 12 月 5 日的社論中，主張甲午戰後日本是戰勝國，所以有充分理由要求割讓臺灣，以繼續維持琉球的安全，他說：²⁴

清國政府的年報，顯然將沖繩縣劃入版圖，眼中全無我國主權，其胡為實非語言所能表達。它所以迄今尚未滋事，實因為國內有迫切困難，該國政府無暇顧及而已。

²² 陳逸雄譯解：《福澤諭吉的臺灣論說》（一）（二）（三）（四），《臺灣風物》41 卷 1 期及 2 期，42 卷 1 期及 2 期（1991 年 3 月及 6 月，1992 年 3 月及 6 月）。

²³ 吳密察：前引文。

²⁴ 福澤諭吉：〈臺灣割讓を指令するの理由〉，《時事新報》（1894 年 12 月 5 日）社論，陳逸雄譯解：〈福澤諭吉的臺灣論說（一）〉，《臺灣風物》，41 卷 1 期（1991 年 3 月），頁 88。

苟有餘力，它的野心在於將臺灣作為軍事基地，來侵犯我國邊境；這是多年來昭然若揭的事實，因此臺灣是我榻傍的鼾聲，為了維持永久和平，把它收歸我有，乃日本當務之急，令其割讓該地，豈有敢置一句非議者？我不是說為了日本的方便要略取臺灣，而祇是為了我國邊境沖繩的安全，要根除支那人的野心而已。這也是戒備邊境的正當防衛手段之一，希望世人不要忽視這種軍國的大道理。

福澤諭吉認為，日本不僅基於琉球的安全而應割據臺灣，而且，更著眼於臺灣可以提供日本的軍事、政治及經濟所需的經費。福澤諭吉說：²⁵

這次的臺灣，目前固然不容易償還軍、政費用；惟該地氣候溫暖、物產豐富，今後極有希望，若以陸海軍防衛，同時用正直的政令保障生命財產，使內外人士安居樂業，必可帶來繁榮；這樣便能使日本國民年年歲歲多得利益，這種利益就是國家永遠的利益，可以償還軍、政經費而有餘。關於這一點，我敢斷言給以保證。

上面這段話所謂「國家永遠的利益」當然是指日本的利益，臺灣應為日本而存在。所以，福澤諭吉在1895年8月11日社論中，進一步申論說：²⁶

²⁵ 同上註24引文，頁91。

²⁶ 福澤諭吉：〈臺灣永遠の方針〉，《時事新報》（1895年8月11日）社論，

該地的處理方法，應該效倣盎格魯撒克遜人種開發美洲大陸的辦法，把無智蒙昧的蠻民盡予驅逐境外，由日本人掌管一切殖產權力，以確定舉全島使之日本化的方針，逐漸付諸實行，以期永遠的大利，是為我所希望。

福澤主張由日本人掌管臺灣一切的殖產權力，以保證使臺灣徹底日本化，這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者的口吻。

(2) 對臺灣的人民的主張：福澤諭吉不僅將臺灣島當作日本的殖民地，而且他筆下的臺灣「土人」，應以最嚴酷的方法加以鎮壓。他在 1896 年 1 月 8 日說：²⁷

我對征討、鎮壓的方法，也有不少遺憾的感覺，但是提起往事無補於事，這次騷動正是絕好的機會，應以軍隊徹底掃蕩，斬草斷根殲滅醜類，將土地盡行沒收，以舉全島為官有地的決意，實行英斷。否則僅止於一時性的鎮壓，今後這種騷動必然迭起，非但措置不妥，而且每有騷動就會引起國內人心的動搖。影響所及，商業的繁榮受到妨礙，甚至有意遷往該地的企業，也會因此取消計劃，致使剛欲向外發展的機運遭受挫折。

收入：同上註 21，頁 95。

²⁷ 福澤諭吉：〈臺灣騷動〉，《時事新報》1896 年 1 月 8 日社論，收入：〈福澤諭吉的臺灣論說（二）〉，《臺灣風物》41 卷 2 期（1991 年 6 月），引文見頁 77。

海外領土的小紛擾雖非國家的大事，但是影響卻不少。我欲再向當道勸告；應該當機立斷，一舉消除禍根，永久斷絕騷動之患。

福澤進一步主張：在經過嚴酷的鎮壓與掃蕩之後，應再嚴格檢查臺灣人是否真正順從，他說：²⁸

關於處理臺灣的騷動，如在前號論述，無非下定英斷殲滅醜類，使其一人無存，以期掃蕩全島。該島民等狡獪，遭遇我大軍便臨時佯裝順民，窺悉兵力單薄就忽然蜂起逞兇，其無智寧可垂憐，然而他們的本性頑冥不靈，究竟未能醒悟，應以除非將其殲滅別無辦法的覺悟，一舉掃盡醜類。或有人以為他們之中，不無真正的順民。而竟一舉予以殲滅，未免太殘忍，不過我說殲滅，意非併合其種族予以殲滅。

願意順從我國的人民，就是日本國的良民，當然應該厚加保護，但是如果僅以表面上的順從，便認為良民，則是一大錯誤。比如這次騷動，實際上必有煽動者，惟響應煽動而蜂起的幾萬賊徒，不外是平時認為良民的徒輩。他們並非從心底真正服從，徵之事實已經明顯，所以縱使再遭大軍征討而表示一時的順從，對曾經響應煽

²⁸ 福澤諭吉：〈臺灣善後方針〉，《時事新報》（1896年1月15日）社論，收入：〈福澤諭吉的臺灣論說（二）〉，引文見頁77-78。「土人」一詞可指住在臺灣的人，也可指為未開化的人。

動而抗拒我國者，斷不可寬容，應該悉予付問軍律，給予嚴重的處分。

爲什麼應對臺灣人採取這樣的鎮壓手段呢？福澤諭吉解釋說，這是因爲臺灣的人是「純粹的外國人民」，²⁹而且：³⁰

因為當初已經清楚，令其割地之目的，完全在土地而不在人民，所以關於處理該島的問題，當局這應該僅考慮土地，斷不可把島民置於眼中。應該抱持一種覺悟，以爲實際上得到名叫臺灣的無人島，從而決定經營的大方針。如果按照這方針辦事，百般問題迎刃可解，一定非常容易，毫無困難。應該斷行所欲爲，目的唯在收取土地。如果該島民等心服我政令，而真正表示順民之實，即令他們不投我們所好，實際上也未便給予嚴重的處分。可是他們非但不從心底歸服，動輒相率企圖反抗，殺戮我官吏人民，實爲頑迷非法之徒，迄今騷亂不絕，寧可趁其頻繁騷動的機曾，固應將罪狀明白者，付諸嚴重處罰，而苟有幫助或隱蔽嫌疑者，則不留情地驅逐境外，並將其土地財產等，盡予沒收爲官有。

福澤諭吉在 1896 年 8 月 8 日，更赤裸裸地宣稱，應將臺

²⁹ 福澤諭吉：〈臺灣施政の官吏〉，《時事新報》（1896 年 7 月 19 日）社論，收入：〈福澤諭吉の臺灣論說（三）〉，《臺灣風物》42 卷 1 期（1992 年 3 月），引文見頁 130。

³⁰ 福澤諭吉：〈先づ大方針を定む可し〉，《時事新報》（1896 年 7 月 29 日）社論，收入：〈福澤諭吉の臺灣論說（三）〉，引文見頁 131-132。

灣當作「無人島」，他說：³¹

關於處理臺灣的問題，我的意見認為應以嚴格為旨趣，絲毫不寬貸，苟有島民等反抗的跡象，固然要以嚴刑處罰，至於鴉片，則施行與內地相同的法律，不能承受的人，不留情地驅除出境。要之，我認為應將全島看成無人島行事，唯希望當局對此該有英斷，這種論旨，諒讀者已經有所瞭解。

{…}

我敢保證，實際上的處置，沒有他們想像那麼麻煩。本來該島民企圖反抗，正是道地的螳臂當車。臺灣人雖愚，應該自能量力察覺利害，惟因他們不詳悉日本人的力量，所謂初生犢不怕虎，而妄作抵抗，只要將實力顯示其眼前，儘管他們無知，當能悟之不可爭而自行屏息。以土匪的蜂起為例，據悉去年以來，經我軍掃蕩流血的地方大都平穩，而騷動的發生，限於我軍通過而未流血的地方。就是因為不知日本軍的力量。他們纔會蜂起，所以，凡是有反抗形跡的人，應該盡予誅殺，使其一人無存，以殲滅醜類。三百萬島民當然不可能盡為不軌之徒，即使有異志之輩，如果目睹可怕的事實，也會改心變成順民。這是殺一儆百的辦法，土匪之類即使盡

³¹ 福澤諭吉：〈臺灣島民の處分基だ容易なり〉，《時事新報》（1896年8月8日）社論，收入：〈福澤諭吉的臺灣論說（三）〉，引文見頁135-136。

殺，為數並不多，而促使全島民翻然悔悟的功效卻很大。所以，我主張應該給予嚴重的處分。

根據福澤上述的言論，福澤主張「凡是有反抗形跡的人，應該盡予誅殺，使其一人無存」，如此就可以使臺灣人「改心變成順民」，這是典型的帝國主義者的論調。

現在，我們將福澤論吉的臺灣論述，與他在日本國內所提倡的「文明開化」論點加以對比，就可以看出：作為臺灣論述者的福澤論吉，與作為日本啓蒙思想家的福澤論吉，不僅判若兩人，而且形同水火，兩者絕不相容。

(3)「平等」價值及其背叛：福澤論吉在《勸學篇》這本影響近代日本至深且鉅的書的第一篇〈學問的旨趣〉第一段，令人動容地宣稱：³²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這就是說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來就有貴賤上下之別的。人類作為萬物之最，本應依憑身心的活動，取得天地間一切物資，以滿足衣食住的需要，大家自由自在，互不妨害地安樂度日。

他在此書第二篇又申論「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之義說：³³

³² 福澤論吉著，群力譯：《勸學篇》，頁2。

³³ 《勸學篇》，頁9。

人的出生是天之使然，而非由於人力。他們之所以能夠互相敬愛，各盡其責和互不妨害，是由於根本上都是同一人類，共戴一天，並同為天地間的造物。譬如一家之內兄弟和睦相處，根本上也是基於同系一家兄弟，共戴一父一母的人倫大義。

所以如就人與人之間的均衡一致而論，我們不能不說人與人是平等的。但是這種平等並不是現實情況上的平等，而是指基本權利上的平等。

福澤諭吉不僅主張人與人應平等，而且在此書第三篇中，他進一步申論國與國之間也應求其平等。福澤說：³⁴

凡名為人，無論貧富強弱，又無論人民或政府，在權利上都是沒有差別的。茲再推廣此意來討論國與國的關係：國家是由人民組成的，日本國是日本人組成的；英國是英國人組成的。既然日本人和英國人同樣是天地間的人，彼此就沒有妨害權利的道理。一個人既沒有加害於另一個人的道理；兩個人也沒有加害於另外兩個人的道理；百萬人、千萬人也應該這樣。事物的道理原不能由人數多少來變更的。

福澤諭吉在上文中說：「日本人和英國人同樣是天地間的人」，所以「一個人〔…〕沒有加害另一個人的道理」，但這項

³⁴ 《勸學篇》，頁 13。

平等原則顯然並不適用於在臺灣的人。福澤曾說日本佔領臺灣以後，「凡是有反抗形跡的人，應該盡予誅殺」，³⁵福澤諭吉自我矛盾前後有如此者！

(4)「自由」價值及其背叛：福澤諭吉在《勸學篇》第7篇，引述美國教育家威蘭德（Francis Wayland, 1796-1865）的學說，強調「勿以自己的意志強制他人」，他說：³⁶

我們做人的道理，就在於不妨害他人的權利，自由自在地運用自己的身體。至於行其所好，忍其所欲，或事勞動，或事嬉遊，或為此事，或務彼業，或則昏夜用功，或則懶散無為，終日蜷伏安寢，因與他人不發生關係，也就沒有從旁議論其是非的理由。

福澤在這裡宣傳的是近代西方一個重要價值理念——自由。

但是令人驚訝的是，福澤諭吉在日本宣揚「文明開化」論時，所高舉的文明社會之價值——自由，並不適用於臺灣人民。我們看看福澤對臺灣人所發表的言論：³⁷

³⁵ 同上註30。

³⁶ 《勸學篇》，頁45。

³⁷ 福澤諭吉：〈政令に従はざるものは退去せしむ可し〉，《時事新報》1896年7月31日社論，收入：《福澤諭吉的臺灣論說（三）》，引文見頁134。

日本把外國領土收入版圖，以此為首次，自難免有生疏之處，尤其又要顧慮外國的風評，但是若觀察文明諸國對新領土的措施，則非常令人驚訝。某國甚至曾以屬地人民有不軌舉動為由，劃方圓幾里之地，凡是居住其中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悉予屠殺。也有本國人在新得領土的野外打獵，因誤認而槍殺土人，經檢察官起訴後，本人出庭申辯完全誤以為狐狸將其擊斃，結果推事非得已而即時放人。這實有其事，由此可以窺知情形的一端。至於現在日本人欲在臺灣禁止鴉片，是真正的正當防衛手段，與這些例子不可同日而語。

這是在世界公眾的面前，堂堂正正行之而毫無忌憚的事，希望當局者決予斷行，苟有不服從命令者，則不留情地驅逐境外，以收真正版圖之實。

福澤諭吉引述外國帝國主義者屠殺殖民地人民之先例，以證明日本人壓制臺灣人自由之合法性。福澤甚至強力主張凡是不順從日本的臺灣人「應以軍隊徹底掃蕩，斬草斷根殲滅醜類，將土地盡行沒收，以舉全島為官有地的決意，實行英斷」。³⁸這樣對待臺灣人民的言論，很難想像是出自在日本提倡自由平等「文明開化」價值的啓蒙大師之口！

³⁸ 同上註 26。

(三) 內藤湖南

內藤湖南心儀中華文化，1899(明治 32)年 9 月初遊中國，他用「痛惜」二字形容初見山東榮成灣之荒涼的感受，³⁹他遊北京崇文門感到「無限淒涼，不覺淚下」，⁴⁰他醉心於西湖月色，不免賦詩抒感。⁴¹內藤湖南心靈深處躍動著熾熱的中國情懷。他曾撰文反駁明治 20 年(光緒 13 年，1887 年)前後隨著日本國民意識高漲而來的「日本人的天職」之類的口號，⁴²他關心 20 世紀中國政治的走向，《內藤湖南全集》第 5 卷收錄〈時事論〉、〈清朝興衰亡論〉、〈支那論〉及〈新支那論〉等論文，內藤的現實關懷躍然紙上，他對中國前途的言論前後頗有變化，值得細加分析。內藤湖南在旅遊中國之前，先來臺灣，時在 1897(明治 30)年 4 月，停留到 1898(明治 31)年 4 月返回日本。

懷抱著這樣激烈對中華文化的嚮往，內藤湖南滯留臺灣一年多的期間，自然流露他對中華歷史英雄人物的景仰之情。例如 1897 年 10 月 10 日在《臺灣日報》賦〈亡題〉詩云：⁴³

³⁹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收入：《內藤湖南全集》第 2 卷，頁 22。

⁴⁰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收入：《內藤湖南全集》第 2 卷，頁 39。

⁴¹ 同上書，頁 40-41。

⁴² 內藤撰有〈支那論〉、〈清國の立憲政治〉、〈日本の天職と學者〉以及〈所謂日本の天職〉等文，其中前二篇已由傅佛果譯為英文：Joshua A. Fogel, ed. and tr.,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Vol. XVII, No. 1, (Fall, 1983): *Naito Kon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ity in Chinese History*, pp. 24-87。

⁴³ 《內藤湖南全集》第 2 卷，頁 446。

正正堂堂國姓爺，丹心報國誓無他。
當年英爽歸東極，直到如今不少差。

又賦〈似守備兵三首〉其一云：⁴⁴

臺灣一萬有餘兵，忍使居民屢喫驚。
一賊難擒人巷議，使君朝夕仰天行。

這些詩作，處處流露出內藤湖南對鄭成功的景仰與對臺灣治安的關懷。

但是，這一位心儀中華文化，「白首兼優才學識，青衿穿貫史經文」⁴⁵的漢學大師內藤湖南，在面對日本的新殖民地臺灣時，卻展現類似福澤諭吉的帝國主義者的論調。我們細繹內藤湖南的臺灣論述，可以歸納其具有帝國主義思想傾向的論點如下：

(1) 臺灣人應與日本人同化：1897年7月27日，內藤湖南主張佔領臺灣之後約10年，應將臺灣的生活習俗完全改變，以便同化於日本。這種移風易俗之事甚至不必等待數十年就可

⁴⁴ 同上註。詩題中之「似」字疑為「擬」字之誤植。

⁴⁵ 鈴木虎雄〈奉送湖南前輩蒙命西航〉詩，收入：《航歐集》，內藤湖南自印本，現藏日本關西大學總圖書館「內藤文庫」。《航歐集》係1926年（大正15年丙寅）9月，內藤虎次郎自印之詩集，內有內藤虎次郎手書「航歐十五律」並附有鈴木虎雄、狩野直喜、荒木寅、長尾甲、內村資深、倉石武（四郎）、等友生贈詩，很能反映20世紀初期日本漢學者舊學之素養。

見績效，例如李春生（1838-1924）、辜顯榮（1866-1937）、陳春光（1834-1907）等臺灣名流已經斷髮，接受日本習俗。除了改變臺灣人的辮髮纏足等風俗習慣之外，內藤湖南也主張，日本殖民政府對率先接受日本習俗的人，除了授與紳章以資獎勵之外，也應授與羽織袴等日本服飾。對國語（案：指日語）學校的員生之俊秀者，亦應優予賞賜。⁴⁶

（2）臺灣施政乃是為日本殖民之所需：內藤湖南在臺灣滯留期間，雖然主張澈底改變臺灣人的傳統生活習俗，以接受日本同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內藤湖南卻強力駁斥當時一度流行的對待臺民的「一視同仁說」。當時有一部份人士意見以為，臺灣既已成為日本屬地，臺灣三百萬人既已入日本帝國之國籍，自應與日本人一視同仁，同等對待。內藤湖南強烈反對這種「一視同仁說」。

內藤湖南認為，精緻的文明政治是人類經歷諸多失敗，損失諸多生命與財產才能贏得。如果將這種福祉施予後進地區的人民，則與人道的常規與人間同情之旨意有所違背，而且，這種做法不僅是不明時情，更是不察理勢。內藤湖南指出：臺灣的人民與一般生蕃，都是非常低等的種族，既無國家觀念，亦缺乏惻隱之心，只有趨名好利，不適合「一視同仁」的德政。

內藤湖南又指出，日本經營新領土臺灣最大的目的在於將

⁴⁶ 內藤湖南：〈移風易俗の一環〉，收入：《內藤湖南全集》第2卷，頁388-390。

日本本國過剩的人民移入臺灣，以便振興產業。世界各強國的做法均一致。「一視同仁」之德政實不可取。⁴⁷內藤湖南又強調，割臺之後兩年內，日本死傷數千人，國帑損失一億數千萬圓，投入民政經費數百萬圓。如果臺灣施政的目的，僅是爲了臺灣之百萬「土人」（這是內藤用語）之福祉，那麼，日本國民開拓領土的本旨又何在哉？⁴⁸

從上文所歸納的上野專一、福澤諭吉與內藤湖南等三位日本人，在 19 世紀末年所發表的有關臺灣論述，我們可以看出：這三位日本人雖然專業各有不同，但是，他們的臺灣論都展現擴張本國權力於臺灣的土地與人民的帝國主義思想傾向。這種對臺灣的帝國主義論調，與他們在國內所提倡的文明價值觀，互相抵牾。

四、「以西洋文明為目標」⁴⁹：近代日本知識份子的盲點

從上文第二及第三節的論述，我們發現 19 世紀末年這三位日本人的臺灣論都充滿了近似的帝國主義思想傾向，其中職業外交官上野專一因係國家公務員身份，所以必須從母國利益

⁴⁷ 內藤湖南：〈變通なき一視同仁〉收入：《內藤湖南全集》第 2 卷，頁 394-396。

⁴⁸ 內藤湖南：〈臺灣政治の大目的〉收入：《內藤湖南全集》第 2 卷，頁 401-409。

⁴⁹ 福澤諭吉著，北京編譯社譯：《文明論概略》（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第二章：〈以西洋文明為目標〉，頁 9-29。

考量臺灣，可以存而不論；但是，何以提倡「文明開化」的啓蒙思想家，與官方保持距離的⁵⁰福澤諭吉，與推崇中華文化的漢學家內藤湖南，卻也不能免於帝國主義思想傾向呢？這是我們必須進一步探索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線索頗爲複雜，從外緣歷史背景來看，在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前後，也就是明治 20（1897）年代，隨著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日本國內的國民意識日趨成熟，所謂「日本人的天職」之類的口號與思想氛圍瀰漫於全國。日本人自以爲是新文明的代表。⁵¹而 19 世紀末正是西方列強東侵，中國國勢危殆的時刻。中日兩國差距日甚一日。舉例言之，日本佔領臺灣以後，殖民政府當局邀請當時臺灣首富李春生赴日訪問。李春生訪問日本時，對日本的新文明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對日本社會學校之盛、博物院及勸工場之巧、新報館之多、耶穌教堂與信徒之衆均稱道不已，並就日本與中國社會的男女關係、衛生教育、宗教信仰、君臣關係、夫婦關係、軍事策略、自強方針、防止貪瀆等各方面加以比較，對日本的進步大加稱揚。⁵²在 19 世紀末期的東亞，日本實已取得領先之地位。這個外緣

⁵⁰ 福澤諭吉自稱：「政府如果是個酒館，那麼我就是個不善喝酒的人」，見：《福澤諭吉自傳》，頁 261。

⁵¹ 參看：增淵龍夫：《歷史家の同時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東京：岩波書店，1983），頁 55。

⁵² 參看：李春生：《東遊六十四日隨筆》（福州：美華書局，1896），頁 9、26、31、41、45、50、53、56、60、69、72、73、80、81、85。並參考：古偉瀛：〈從棄地移民到日籍華人—試論李春生的日本經驗〉，收入李明輝編：《李春生的思想與時代》（臺北：正中書局，1995），頁 166-216。

的歷史背景，是福澤諭吉與內藤湖南提出臺灣論述時的客觀脈絡。

但是，更進一步從福澤諭吉與內藤湖南思想的內在脈絡來看，我們就可以發現，這兩位日本知識份子都有他們思考上的盲點。這項盲點在於：19世紀末日本知識份子的世界觀與學問觀，莫不以西洋文化為其學習之目標，因此，他們基本上戴上了近代西方的眼鏡來看包括臺灣在內的亞洲各國，他們認為文明落後於日本的臺灣，接受日本的殖民乃至同化，實屬歷史的必然。他們假定文明的發展有其階段性與層級性，先進的國家必然支配落後的國家。他們對臺灣的諸多言論，就是建立在「文明發展階段論」之上。

我們先從福澤諭吉的文明論說起。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第1章結尾時向日本人提出一個問題：在今天這個時代，是應該前進呢？還是應該後退？是進而追求文化呢？還是退而回到野蠻呢？接著，他在第2章提出他的解答說：⁵³

現代世界的文明情況，要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為半開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國家算是野蠻的國家。這種說法已經成為世界的通論，不僅西洋各國人民自詡為文明，就是那些半開化和野蠻的人民也不以這種說法為侮辱，並且也

⁵³ 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頁9。

沒有不接受這個說法而強要誇耀本國的情況為勝於西洋的。不但不這樣想，而且稍識事理的人，對事理懂得越透澈，越能洞悉本國的情況，越明了本國情況，也就越覺得自己國家還不如西洋，而感到憂慮不安。於是有的就想效仿西洋，有的就想發奮圖強以與西洋並駕齊驅。亞洲各國有識之士的終身事並似乎只在於此。（連守舊的中國人，近來也派遣了西洋留學生，其憂國之情由此可見）。所以，文明、半開化、野蠻這些說法是世界的通論，且為世界人民所公認。

在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中，從「野蠻」到「半開化」到「文明」是文明演化必經的不同階段。

福澤諭吉的文明論潛藏著鮮明的演化論的思想傾向，他認為歐美各國是最「文明開化」的國家，是中國與日本這種「半開化」國家學習的對象。達爾文(Charles R. Darwin, 1809-1882)的演化論傳入美國時，正值美國快速工業化之時，所以演化論成為大企業「弱肉強食」的理論基礎；⁵⁴但演化論傳到日本，經轉化為文明的演化論，竟成為新興的日本帝國向外侵略殖民的理由。福澤諭吉以演化論為基礎的文明論，正是他所提倡的「以西洋文明為目標」所必然導致的結論。

⁵⁴ 參考：Bert James Loewenberg, "Darwinism Comes to America, 1859-1900," *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XXVIII: 3 (Dec., 1941), pp. 339-368, 尤其是 p.343。

在上述這種文明演進的階段論之下，福澤之所以對臺灣採取帝國主義的主張，就可以理解了。在福澤諭吉看來，他在日本國內所提倡的自由民權並不適用於文明較日本落後的臺灣。而且，文明較為先進的日本殖民並開發文明較為落後的臺灣，正符合歷史的進程。

內藤湖南對文明發展的看法，與福澤諭吉略有出入。內藤湖南認為文明的發展與「時」很有關係，他說：「夫河洛之澤盡，而關內之化盛；北方之文物枯，而南方之人文榮，亦以時而命之所也。埃及、西亞利亞、印度、波斯、菲尼斯亞、希臘、羅馬，相踵遞起，而各以時而命也」，⁵⁵他認為經過明治維新的成功，日本已代歐洲而興起，已成為世界新文明的中心。

事實上，在「內藤史學」的學術世界裡，內藤雖然推崇中華文化，主張公元第 10 世紀唐宋之際是中國近世史的開始，⁵⁶但是，內藤史學世界中的所謂中國之「近世」，實以近代歐洲史作為參考架構。他所提出的作為中國之「近世」的各項歷史發展指標，也都是以近代歐洲的發展作為典範。⁵⁷我們可以說，

⁵⁵ 內藤湖南：〈日本の天職と學者〉，收入《內藤湖南全集》第 1 卷，頁 130。此文原發表於明治 27 年（1894 年，清光緒 20 年，甲午）11 月 9 日、10 日之《大阪朝日新聞》。

⁵⁶ 內藤湖南：〈概括の唐宋時代觀〉，《歷史と地理》第 9 卷第 5 號（1922 年 5 月），頁 1-11。此文有中譯本：〈概括の唐宋時代觀〉，收入劉俊文主編，黃約瑟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 1 卷：通論，頁 10-18。

⁵⁷ 關於這一點，參考：Hisayuki Miyakawa (宮川尚志)，"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Far Eastern Quarterly*, XIV:4 (August, 1955), pp.533-552.

在內藤湖南的世界觀與史學世界裡，正是以福澤所說的「以西洋文明為目標」作為核心基礎。

總結本節所論，19世紀末年日本的知識份子如福澤諭吉與內藤湖南，都是典型的以近代西洋文明為師的人。他們吸收近代西方的文明演進觀點，並以這種觀點論述日本對待臺灣的立場，終於流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意識型態的幫兇而不自知，其情可憫，其事可歎！

五、結論

本文以 19 世紀末年一位日本外交官以及兩位日本知名學者作為實例，探討這三位日本人對臺灣所發表的種種言論，及其思想或理論之基礎。我們的分析顯示：這三位 19 世紀末年發表臺灣論述的日本人，都呈現相當近似的帝國主義思想傾向。他們都主張佔領臺灣之土地，役使並同化臺灣之人民。其中尤其是福澤諭吉宣稱應將臺灣視為「無人島」處理，其言論最具帝國主義之色彩。福澤諭吉的臺灣論澈澈底底地背叛他在日本所大力提倡的「自由」與「平等」等新文明的價值。

本文也探討福澤諭吉與內藤湖南的臺灣論的思想基礎，指出他們兩位知識份子都以近代西方為師，都認為近代西方是文明演化之最高峰。在他們的思想中，文明的演化有其不同的階段。因此，他們主張文明較高的日本可以奴役文明較低的臺灣，也就獲得了合理化的理由了。從這一點可以看出，近代日

本知識份子在接受西洋近代文明洗禮時，確實出現重大盲點，而使他們淪為日本帝國主義意識型態的急先鋒。（2003年2月2日，本文曾發表於第二屆臺灣史學術研討會）